

#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下的庭前审查程序评析

杨 婷

(云南大学 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庭前审查程序中案卷移送的方式回归到全案移送,其存在着无法防止不当公诉和排除法官预断,以及难以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和辩方庭前参与的弊病。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尚无司法审查制度支持,对检察权和司法权关系定位不当,以及受传统诉讼观念影响所致。就此,我国应该逐步建立预审法官制度,完善配套程序,以实现庭前审查程序的过滤、分流和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功能。

**关键词:**庭前审查程序;刑事诉讼法;司法审查;司法权;预审法官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26-04

## The Assessment of Modified Pretrial Review Process

YANG Ting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revis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makes the pretrial procedure return to transferring whole files, but it is unable to prevent improper prosecution, the exclusion of justice prejudice, and har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eparating cases according difficulty and participating before hearing of the defendant.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no judicial review system support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the improper evaluation of the procuratorial power and judicial authority as well as traditional litigation ideas effects. In order to get the filtration, triage and guarantee of the functions about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pretrial review procedure, the judg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matching procedure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pretrial review proces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judicial review; judicial power; the pre-trial judge system

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庭前审查程序主要是为正式庭审的顺利进行做好准备,虽不是核心性的程序,但却是连接起诉和审判的“枢纽性”程序,是所有公诉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必经的一个环节。当检察院起诉后,法官都要依职权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判断其是否达到开庭审理的条件,是否应将被告人交付法庭审判。因此,庭前审查程序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审查方式的得当性,不仅仅关系着后续程序推进的效率,更关系着控辩双方特别是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庭前审查程序已经成为程序正义性和经济性的标志之一。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经历了首次修改,随后十多年间,由于庭前审查程序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故受到司法界的质疑与批判,广大刑事诉讼法学权威学者都对我国庭前审查制度的再修改纷纷建言献策,并提出了完善的具体意见。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庭前审查制度吸取这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又恢复到1979年的做法,但其中缘由、还存在何种弊病以及该如何再完善等问题

仍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刑事庭前审查程序进行再修改前后的对比,分析了再修改后的庭前审查程序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历史沿革

### (一)1979年的旧庭前审查程序

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对庭前审查采取全部案卷移送主义。检察院在提起诉讼时,将起诉书、证据和其他案卷材料全部移送给法院,由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进行审查。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应移送全部案卷材料给审判法院,由庭审法官进行庭前审查。若有清楚的犯罪事实和确实充分的证据,法院就可开庭审理;若证据不充分,法院可退回补充侦查;若法官认为有需要,还可自行取证。<sup>①</sup>不难看出审判人员在庭前可以接触到

收稿日期:2012-07-23

作者简介:杨婷(1987—),女(回族),云南昆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① 参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清楚,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第10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

全部案卷材料,并且可以主动取证,因此法官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容易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偏见”,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先定后审的现象,使庭审过程流于形式。虽然最终的审判结果未必是错误的,但普通民众对审判的信任度将会大打折扣。

## (二)1996年的庭前审查程序

为了改变1979年旧庭前审查制度存在的“预断”和庭审“走过场”的情况,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庭前审查程序做出了重大变革。在确立以控辩方举证为特点的所谓“控辩式”或“类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同时<sup>[1]</sup>,对庭前审查做出以下改变:第一,检察院起诉时案件的移送方式由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改为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主要证据复印件包括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sup>①</sup>,由此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的内容不再是提起公诉案件的全部证据材料,而是主要证据复印件等;第二,降低了法院开庭审理的条件,由原来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只要在起诉书中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随案附有法律规定的主要证据复印件即可。从法院降低开庭审理的标准来看,可以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审查只是一种程序审而非以前的实质审,这是借鉴了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目的是防止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进行先定后审,让法官在庭前接触不到全部证据,使法官主要是通过庭审中审查判断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强调了庭审的作用和价值。<sup>[2]</sup>

## (三)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庭前审查程序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二个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庭前审查程序吸取这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将案卷移送方式恢复到1979年的做法,即检察官在提起公诉后,应当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而不再是现行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在当代法治国家,几乎所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都有两个核心目的:一个是保证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另一个就是寻求一种确保程序有效实施的简便的、迅速的途径和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审查程序的再修改也不例外,也是为了使庭前审查程序更加有效地进行。即使1996年刑事诉讼法要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只需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在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庭前审查时都会要求检察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而检察院也会积极配合。法官通过全面阅卷熟悉案情,从而为正式庭审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此,很多学者都担心庭前全面阅卷会导致“预断”和庭审“走过场”。但据有关学者调查了解,法院的做法并没有对庭审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对庭审顺利推进更为有利。修正案中“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的规定,虽然又回到“老路”上去,却也是符合我国司法现实情况的一种选择。<sup>[3]</sup>可以说,庭前审查程序中案卷移送方式的回归,一方面解决了实践与法律规定的冲突,另一方面法官提前阅卷熟悉案情,也将更有效地发挥庭前审查程序对于正式庭审的准备功能。

## 二、再修改后庭前审查程序的症结

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庭前审查程序中的案卷移送方式又回归到1979年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实现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的统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仅仅是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还不能够彻底解决我国庭前审查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与其他法治国家的“预审”相比,其应具有的功能尚未完全体现出来。具体而言,再修改后的庭前审查程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症结:

### (一)不当追诉没有得到有效制约

设置庭前审查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检察院的权力,防止不当追诉,为正式庭审把好“入口关”。按照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在正式提起公诉时应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法院享有庭前阅卷权,阅卷审查后认为指控证据不充分的有权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这表明法院在庭审前对检察院的起诉进行实质审查而不仅是程序审查。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开庭审理的标准为在进行庭前审查时,检察院提交的起诉书记录了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由此,只要案件属于本院管辖,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法院就应当开庭审判。法院对检察院的起诉只是进行形式审,这样就很难发现证据有不足的地方,而且也不能以材料不足为由拒绝开庭审理案件和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这实质上造成了庭前审查的虚无化,难防检察院的错诉、滥诉,也不利于被告人的利益保障,因此现行庭前审查程序缺乏抑制公诉、过滤案件的功能。

### (二)预断没有得到全面预防

在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审判制度中,应该保持法官中立,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庭前排除法官提前接触案件证据材料,就是为了实现审判时法官保持客观中立的目标。为此,很多国家在立

<sup>①</sup>参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法和实践上均实行预审法官和审判法官相分离的方法:预审法官可以在庭前接触到案件材料,但不能参加正式庭审过程;审判法官可以参加正式庭审程序,但不能提前接触到案件证据材料。目前,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和正式庭审程序均由承办法官主持进行,法官庭前接触大部分证据材料,排除预断的意图难以实现。将案卷移送方式由主要证据复印件变为全案移送,法官在庭前就能接触到几乎全部的证据材料,这既包括指控被告有罪的证据,也包括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法官全面熟悉案情,这一点虽是有利于庭审的顺利进行,但却增加了预断的可能性。

### (三) 案件分流的目的未能实现

分流功能是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另一个基本功能。由于刑事案件不可能千篇一律,案件之间存在着繁简、难易、被告人是否认罪等具体情况的差异,如果所有案件一律适用正式的普通审判程序或者是同样的审判程序,势必使司法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合理配置,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庭前审查程序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对经过法官初步审查后满足开庭审理标准的公诉案件,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参照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适用条件,对案件进行筛选,从而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实现繁简分流,这也体现了程序和案件相适应的原则。然而,不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还是2012年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在庭前审查这一环节中赋予法院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的权力。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奉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则可以不经实体上的定罪而直接进入量刑程序,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分流功能的典型体现。因此,我国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经过再修改后仍然缺失对案件分流的功能。

### (四) 证据开示及辩方参与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确立起证据开示制度,而证据开示却是很多国家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功能。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虽然控辩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较大,实质上辩方还是处于较劣势的地位。承担着追诉犯罪之责的警察和检察官,其取证能力比被告人强大太多,因此若不设计一个制度来平衡双方悬殊的力量,那被告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而庭前审查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控辩双方在此程序中要进行证据开示,这样就可以使取证能力相对较弱的辩方能够及时了解到控方所掌握的证据,增强辩方的对抗性。此外,经过证据开示后,控辩双方的证据也就被固定下来了,不得在庭审过程中随意提出新证据,给对方造成证据突袭,这也可保障庭审程序的不间断进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并

未确立起证据开示制度,加之实践中的种种做法,使得律师的辩护常常受阻、举步维艰。同时,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庭前审查通过什么形式来进行也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是通过阅卷来进行书面审查,这就容易导致法官只是单方面接触到控方的证据材料而产生偏见。另外,由于辩方很难及时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无法有效制约庭前审查活动,辩方的参与性不高。

## 三、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存在缺陷的原因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在不断寻求程序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庭前审查程序就是兼顾程序公正和司法现状、兼顾新旧制度后妥协的典型产物,在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弊病和缺陷。导致这些弊病和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我国刑事诉讼中缺少司法审查制度的支持

司法审查是通过一种国家权力来制约另一种国家权力。现代法治国家基本上都设立这项制度。因此,司法审查制度也成为了追求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民主法治的标志之一。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并没有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由于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整体缺失,也致使在审前程序中没有一个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审查和制约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各种追诉行为。

从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实践中,三机关之间的配合较多,制约较少。这是和立法意图不相符的地方。检察院同公安机关同为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关,其侦、控行为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行政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单方性,即行为由主体机关单方面做出。检察院被行政化了的指控行为也不例外,法院无权对其进行审查。即便是现有的庭前审查程序也只是侧重庭前的准备性工作,至于制约检察院和抑制公诉权的功能则很难实现。虽然对于检察院的不当追诉,可以通过后续的审判程序来予以纠正,但在审前却是无法得到救济。有学者就提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院针对追诉行为合法性而进行的司法审查极为薄弱,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sup>[4]</sup>。

### (二) 对检察权性质的认定不恰当

法院享有审判权,检察院享有检察权。审判权是一项司法权,那么如何定位检察权就将影响到审判权和检察权之间的关系,即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的关系。目前,对检察权法律性质的定位,学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以及法律监督权说。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了检察院是我国的法

律监督机关,加之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的主流观点,检察机关就拥有了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权,而法院却没有对检察机关的法定监督权。因此,在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比法院高的同时,也使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位于审判权之上。由此,居于下位的法院自然无权对检察院的公诉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审查,而所谓的庭前审查程序也就只能是形式上的存在,无法具备实质上的审查功能。

### (三)司法权权威的缺乏

如上文所述,由于检察权具有法律监督权的地位,因此检察权具有比法院的司法权更高的权威性,这导致法院无力对检察院的公诉进行审查和制约。此外,虽然我国从立法上明确了法院所享有的独立审判权,但由于具有程序基础性意义的“司法独立”原则并未真正确立,实践中,具体案件的管辖法院及承办法官都要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很难实现独立审判,这也使司法权威受到很大的威胁。又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受人治理念的影响,使法治的成长缺少一个良好的诉讼文化环境,司法常常受到行政的影响,司法权的权威需要其他权力的权威来保护。就这样,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虽然有审查的外观,却没有审查的实质。当司法权在检察权面前没有应有的权威时,司法控权的希望将会落空,而以法院审查检察院的公诉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庭前审查程序也就难以落实。

### (四)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深入人心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农耕经济,缺乏商品交换和竞争,人们都有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思想,延伸到其他领域,就是注重对实体性结果的追求而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农耕经济的是民主和法治的缺乏。一直以来,人们对犯罪者持一种因果报应的态度,要求对犯罪人进行处罚,至于怎样处罚或过程如何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国家主义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也使我们的刑事诉讼更多地追求实体真实,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和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实践中,只要能够发现犯罪、控制犯罪、打击犯罪,即使是程序上存在一些瑕疵也是能够容忍的,并不会影响到最终追诉犯罪的目的。设置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体现出程序性价值,但是由于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深入人心,而正当程序原则又未很好地落实,这就导致客观上设立了一个制度而主观上根本没有严格执行的意愿。

## 四、完善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建议

庭前审查程序作为提起公诉和正式审判的衔接环节,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容小视。合理、科学地设计刑事庭前审查程序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公平等诉讼价值,有利于贯彻保障人权的原则,有利于促进整个诉讼流程的推进。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再修改后的庭前审查程序仍然存在诸多弊端,这不利于和谐司法的建设,故需要我们采取措施来完善。据此,笔者建议应逐步建立我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实现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分离。

目前我国的整个刑事诉讼并没有这样一个中立的、非审判的、专门的裁判机构来对程序中的问题进行审查、作出裁决,这就导致包括庭前审查的整个审前程序都缺乏司法审查的限制,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这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和正义受到较大的冲击。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建立预审法官制度,由专门的、不承担审判任务的职业法官担任。如果目前要单独设立预审法院还存在资源、体制和成本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采取“相对合理主义”<sup>①</sup>,在法院内部设立预审庭,这也是目前大部分学者比较支持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做到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在职位设置和信息上相分离,保证二者在庭审前没有任何交流有关案件信息的机会,否则就难以实现真正的排除预断。当然,设立预审庭后,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不属于同一部门,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机会相对较少,但由于他们还是属于同一法院,因此不可能完全避免他们进行实质上的接触。

在预审法官制度中,预审法官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审前程序,对各种与公民权益相关的强制侦查行为,诸如逮捕、羁押、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签发许可令。<sup>[5]</sup>此外,各国在设置预审制度的同时,还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配套制度,而证据开示就是最重要的一项。因为证据开示可以使法官更加了解案情,可以使双方当事人庭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可以提高被告人在法庭上的对抗能力,可以保障庭审过程不间断地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实现案件分流,提高审判质量。因此,我们在完善我国的庭前审查制度或建立我国的预审法官制度时,应该考虑在证据开示方面作出有关规定。

(下转第38页)

<sup>①</sup>相对合理主义,是龙宗智教授针对目前司法改革热提出的观点。在不尽如人意的司法环境和条件之下,我们无法追求完美,只能到达一种相对合理的状态。这是一种理性的权衡。如果不考虑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一味追求完美,不但目标实现不了,而且还很有可能破坏改革前的秩序和已到达的水平。

如果反诉被告认为自己需要收集证据,而证据的收集比较困难时,法院还要赋予反诉被告以一定的举证期限,以保证反诉被告收集到反驳反诉原告请求的足够多的证据。最后,法院还要组织双方当事人当庭提出证据、相互询问和辩论,并根据相关的证据和事实作出是否支持反诉的决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如果案情复杂,想要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期限内完成是不可能的,造成诉讼拖延的可能性非常大。

此外,在适用反诉制度时势必会引起再反诉问题,由于:1. 再反诉依然是独立的诉,从保护当事人权益出发,允许反诉,就应允许再反诉;2. 提出再反诉,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地、彻底地解决纠纷<sup>[11]</sup>;3. 对反诉提起再反诉,符合反诉制度的目的,能够避免对同一组有争议的权利义务作出矛盾的判决,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sup>[12]</sup>所以,应当允许在反诉中提起再反诉。这样,对于再反诉,法院又得按照处理反诉的方法进行重复的行为,浪费大量的时间,诉讼拖延势必无法避免。

## 五、小结

综上所述,在民事诉讼中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减少矛盾判决、保障诉讼民主和程序对等、有利于当事人诉权实现的反诉,在刑事附带民诉中却无法体现出相同的价值。由于这两种诉讼程序的目的、适用的原则、程序内容、诉讼观念以及程序运作的不同,导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反诉会拖延诉讼,不利于被告人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保护。此外,

由于反诉对象性质上的差异,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能够相互抵消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这种做法有违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容易扰乱私法秩序。再加上附带民事诉讼反诉的适用案件范围过小,实际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适用反诉。

## 【参考文献】

- [1]江伟,孙邦清. 民事诉讼法[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280.
- [2]谢军.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J]. 法学杂志,2000(2):32-33.
- [3]陈卫东.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7.
- [4]甄贞.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88.
- [5]李峰. 民法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22.
- [6]袁明,崔四星.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探讨[J]. 法律适用,2005(9):75-78.
- [7]陈卫东.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1.
- [8]贝卡里亚. 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7.
- [9]陈瑞华. 看得见的正义[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48.
- [10]房保国. 论反诉[M]//载诉讼法论丛.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06.
- [11]刘家兴. 新中国民事程序理论与适用[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253.
- [12]房保国. 论反诉[M]//载诉讼法论丛.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26.

~~~~~  
(上接第29页)

## 五、结语

要建立我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完善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具体程序问题外,还需要其他制度和程序的支持。因为一项改革工作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甚至需要整个司法体制的保障和诉讼文化思想的支撑。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当事人主义的色彩,改变检察院与被告方悬殊巨大的失衡状态,力促检察院更加当事人化;我们需要实现真正的法官独立,只有这样,通过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分离来排除法官预断的目标才有实际意义;我们还需要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全面落实,因为保证了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利,也就是保证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也就强化了辩方的诉讼地位和能力。此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确立沉默权和无罪推定等问题,不仅仅是建立

预审法官制度需要的制度保障,而且也是促进我国和谐司法发展、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石。当然,改革的道路肯定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但不管怎样,笔者希望能在这一条改革之路上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 【参考文献】

- [1]龙宗智.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77.
- [2]张军,郝银钟. 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专题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2.
- [3]牟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试析[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25(1):90.
- [4]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35.
- [5]陈卫东. 程序正义之路:第二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1.